

文学小丛书

1562
41

阿列霞

库普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阿 列 霞

[俄]库普林著

蓝 英 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阿列霞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82,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5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

书号 10019·2957 定价 0.31元

前　　言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著名作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一代作家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反映了十月革命前三十多年间俄国社会的广阔生活，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风貌的生动材料。

库普林出生于贫寒的小官吏家庭，幼年丧父，六岁便被送入收容孤儿的寄宿学校。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军校和兵营度过的。在军校期间，曾因发表小说违犯军规，被捕入狱。最后因不满腐败的沙皇军队而退伍。库普林为了谋生，曾在南俄一带流浪。他当过搬运工、渔民、小职员、演员和记者。他以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所写的小说引起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注意。一九〇一年起库普林在彼得堡定居，并成为高尔基领导下的民主作家团体“知识社”的成员。

库普林在自己作品中同情劳动人民，抨击沙皇制度，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未能理解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意义，一九一九年流亡国外。后来，他终于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于一九三七年返回祖国，次年在列宁格勒病逝。

库普林在他早期作品中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他始终认为劳动人民才是热爱生活、关心别人的高尚的人。这种对劳动者的热情歌颂鲜明地表现在《阿列霞》中。在这篇小说里，库普林塑造了一位在森林中生长的劳动少女的形象。他笔下的这位“大自然的女儿”，不仅有美丽的容貌，还有一颗更美丽的心灵。而城市文明的代表者伊凡，只不过是貌似善良，其实是一个在传统势力面前软弱无力的个人主义者。作者通过阿列霞同伊凡的相爱，突出了在大自然怀抱中成长起来的阿列霞的优秀品质：她既热烈地爱着伊凡，又不失其自尊。当她确信自己同伊凡的结合不能见容于社会时，便毅然同他分手了。作者告诉我们，只有热爱劳动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爱情和生活的意义。

作者在《阿列霞》中，采用了民间创作的艺术手法，把千变万化的自然界的形象，同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情节的深入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冬日的森林雪景衬托出伊凡狩猎的孤独，在春意盎然的森林背景上，伊凡同阿列霞相识相爱，而在静静的月夜里互相倾吐衷情。暴风雨则预示了这场爱情的悲剧结局。小说《阿列霞》充分体现了库普林的独特的创作才华。但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尘

世之外的人物的歌颂毕竟是作者的一种局限性。只有经过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库普林才加深了对俄国社会的认识。《冈布利努斯》便是他这时期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

“冈布利努斯”是南俄最大港口的一家啤酒馆的名字。小提琴手萨什卡是个有音乐天才的性情温顺的犹太人。他经常在这家啤酒馆演奏，他的琴声反映了劳动者的喜怒哀乐，因此，他成了啤酒馆的顾客们——水手、渔民、工匠们所爱戴的人物。日俄战争爆发后，年近五十的萨什卡应征入伍。他在残酷的战争中侥幸生还，但在沙皇政府煽动的屠犹暴行中丧失一只胳膊。作者通过萨什卡的悲惨遭遇，不仅抨击了屠犹暴行，还以萨什卡这个温顺的“小人物”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行动，说明俄国第一次革命对人民产生的巨大影响。小说结尾处，萨什卡不仅拒绝演奏歌颂沙皇的乐曲，还用提琴痛击沙皇的鹰犬。萨什卡虽然在狱中失去胳膊，但他仍然用陶笛为顾客演奏。库普林写道：“可以把人弄成残废，但艺术能够经受一切，战胜一切。”《冈布利努斯》是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

库普林创作的特点是描写亲身经历过或切身感受过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作者善于表现俄国各阶层、各集团、各行业的人物的特点，生动地刻画出各种类型人物的音容笑貌。他

以丰富而简洁的语言，细腻而清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他总是站在同情“小人物”的立场上去揭露社会矛盾，他的作品很接近契诃夫的人道主义传统。

王 烩

目 次

前 言	1
阿列霞	1
冈布利努斯.....	112

阿 列 霞

—

我的听差、厨师兼猎伴——守林人亚尔莫拉，背着一大捆木柴弯腰走进屋里，把木柴往地板上轰隆一扔，便对着冻僵的手指呵起气来。

“哎呀！院里好大的风啊，少爷，”他说，在炉门前蹲下来。“可得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哟。少爷，给个火儿吧。”

“那末，明天就打不成兔子了，是不是？你看呢，亚尔莫拉？”

“不行，……打不成啦……您听听，风雪多大。现在兔子都躲起来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明天您连一个脚印也甭想看见！”

命运把我抛到波列西耶边界地区沃林省一个荒凉的小村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六个月，于是打猎便成了我唯一的事务和乐趣。老实说，当初有人建议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寂寞无聊，简直难以忍受。我动身的时候还很高兴呢。“波列

西耶……人烟稀少的地方……大自然的怀抱……古朴的风俗……浑厚的天性……”我坐在车厢里想道。“我完全陌生的人民，奇异的风情，独特的语言，而且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充满诗情的神话、传说和歌谣！”那时（既然要讲，就索性和盘托出吧！）我已经在一家小报上登出一篇描述两桩谋杀案和一桩自杀案的短篇小说，所以在理论上懂得，考察风土人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但是……不知是由于佩列勃罗德农民特别难于接近，还是我自己不善于接近他们，——我同他们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他们见到我老远便摘下帽子，等到走过我身旁时再沉着脸说一句：“盖布克”，意思大概是：“愿上帝保佑你”。我试着同他们攀谈，他们却惊疑地望着我，似乎连最简单的意思也听不懂，而且还老是要吻我的手——这是波兰农奴制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

我带来的书籍很快就都看完了。为了消闲解闷，——虽然开头我就觉得很不愉快——我曾试图与当地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住在离这儿十五俄里的教士、他门下的“风琴师老爷”、当地的县警察和退伍军曹、邻近庄园的帐房先生交往，但毫无结果。

以后，我又试着为佩列勃罗德农民治病。我手头所能使用的药物只有蓖麻油、石碳酸、硼酸和碘酒。

不料，在我医学知识贫乏之外，偏偏又碰上了完全无法诊断的病人。因为所有患者的症状往往都是一个样的：不是“心口疼”，便是“不能吃也不能喝”。

譬如说吧，有个老太婆来找我。她不好意思地用右手食指把鼻涕抹掉，之后，从怀里掏出两个鸡蛋放在桌上。在她掏鸡蛋的当儿，我看见了她身上褐色的皮肤。接着她就要抓我的手亲吻。我一面把手藏到身后，一面开导她说：“行了，行了，老婆婆，我不是牧师，我不兴这一套……你哪儿不舒服？”

“我心口疼，少爷，心中间儿疼，不想吃也不想喝。”

“你早就有这种毛病吗？”

“我怎么知道呢？”她同样用问题回答。“心里老是烧得慌。不想吃也不想喝。”

不管我怎样问她，也问不出更明确的症状来。

“您别发愁，”有一次那个当帐房先生的退伍军曹劝慰我说。“他们自己会好的，就象狗身上的伤口自己会愈合一样。我禀告您，我给他们看病只用一种药：阿莫尼亚水。农民来找我，我就问他：‘你怎么啦？’‘我病啦。’他说。我马上把盛阿莫尼亚水的小瓶往他鼻子底下一杵：‘闻吧！’他闻了一下……‘再闻一下，使点劲！’他又闻了一下……‘怎么样，好点吧！’——‘好象好点……’——‘那就得啦，走吧，上帝保佑你。’”

此外，吻手的习惯也使我不胜厌恶（而且有的农民干脆下跪，还拼命要吻我的靴子）。须知这绝非出于感戴之忱，只不过是多少世纪的奴役和暴力所训练出来的令人作呕的陋俗罢了。每当看见军曹出身的帐房先生和县警察居然大模大样地把自己两只通红的大巴掌伸到农民嘴边的时候，我实在惊讶不已……

最后，就唯有打猎消遣了。可是，元月下旬天气竟变得如此恶劣，打猎也不可能了。每天狂风怒号，到夜里雪地上便结了一层坚硬的冰壳，兔子即使从上面跑过，也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我闭门枯坐，听着狂风呼啸，心里郁闷极了。因此，我急不可待地抓住象教守林人亚尔莫拉识字这样一种无害的消遣，是很可以理解的。

这件事，开始得相当蹊跷。有一次我正在写信，忽然觉得有人站在我的背后。回头一看，原来是亚尔莫拉。他象平常一样，穿着软底草鞋，不声不响地走到我跟前。

“你有什么事，亚尔莫拉？”我问道。

“我看您是怎么写字的。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不，不，不是象您那样。”他看见我笑了，连忙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只要能写自己的姓名就行了……”

“你要写姓名干什么？”我感到奇怪……（应当说

明，全佩列勃罗德的人都认为，亚尔莫拉是最穷最懒的农民；他把工钱和地里的收入统统换酒喝了。象他家那样糟糕的牛，就是在整个边区也找不出来。依我看，他绝对用不着学写字。）我又怀疑地问了他一遍：“你要写姓名有什么用处呢？”

“少爷，是这么一回事，”亚尔莫拉非常柔和地回答道，“村里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要是签署个公文或者乡里有什么事……谁也办不了……村长只会盖戳子，可是自己也弄不明白盖的是什么……要是有个能签名的人，对大家该多好。”

亚尔莫拉，这个无人不知的偷猎人，这个村会从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眼里的优游自在的野汉，竟然如此关心起本村的公益来了，不禁使我深为感动。于是，我自动提议给他上课。可是要想教会他有意识地阅读和书写，却是一件多么费劲的工作啊！这个亚尔莫拉，对树林中的每条小径，几乎可以说对每棵树都瞭若指掌，这个亚尔莫拉，不论白天和黑夜，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根据狼、兔子和狐狸的踪迹辨别方位，竟然无法想象，比如为什么字母“*м*”和“*a*”能够拼成“*ма*”。通常在这个难题上他得苦苦思索十几分钟，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这时，他那几乎长满黑硬胡须的黝黑瘦削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睛，便流露出思维活动极度紧张的神情。

“亚尔莫拉，你说 ‘*ма*’。就说一声 ‘*ма*’，”

我钉着他不放。“别看纸，看着我，就这样。说一声‘ma’……”

亚尔莫拉长叹了几声，把指字棒放在桌上，用伤心的口气断然说道：

“不行，说不上来……”

“怎么会说不上来呢？这太容易了。你随便说一声‘ma’，就象我这样。”

“不行，说不上来，少爷，我忘了……”

所有的方法、手段和比喻，全都在这颗冥顽不灵的脑袋上撞得粉碎。但亚尔莫拉受教育的愿望却丝毫没有减弱。

“我只要能写出自己的姓名就行了。”他不好意思地一再央求我。“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只要能写出姓名：亚尔莫拉·波普鲁茹克——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

我只好彻底放弃教他有意识地阅读和书写的念头，干脆就教他机械地签名。结果使我大为惊讶，原来这倒是亚尔莫拉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所以到了第二个月的末尾，我们差不多已经学会写姓氏了。至于名字，为了减轻困难，我们决定索性把它省掉。

每天傍晚，亚尔莫拉把几个炉子生着以后，便急不可待地等着我叫他。

“喂，亚尔莫拉，咱们学习吧！”我说。

他侧身走到桌前，把两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再

把蘸水笔夹在僵直不灵的粗黑手指之间，竖起眉毛问我道：

“写吗？”

“写吧！”

亚尔莫拉满有信心地划出第一个字母“П”（我们管这个字母叫做：“两根立柱顶着一根横梁”），然后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

“你怎么不写呀？忘啦？”

“忘啦……”亚尔莫拉懊恼地摇摇头。

“唉！你瞧你！好吧，再画上一只轮子。”

“啊！轮子，轮子……知道啦……”亚尔莫拉活跃起来，用心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的上方拉长了，象地图上的里海一样。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眯着眼睛，脑袋一会儿往左偏，一会儿又往右偏，自己不声不响地欣赏了半天。

“你干吗不写了？往下写吧！”

“稍等一下，少爷……我马上就写。”

他思索了差不多两分钟，然后怯生生地问道：

“跟第一个字母一样？”

“对啦，写吧。”

就这样，我们终于慢慢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母“К”（硬音符号被我们去掉了），我们管这个字母叫做“一根棍儿，中间有个歪钩”。

“您看怎么样，少爷，”有时亚尔莫拉完成自己的

课业之后，带着欣喜和骄傲的神气望着它，向我说道。“如果我再学它个五、六个月，我就完全会写了。您说呢？”

二

亚尔莫拉蹲在炉门前面，拨着炉子里的木炭，我在屋里的两个斜对墙角之间踱来踱去。在偌大的地主宅邸的十二个房间之中，我只占用了过去作为休息室的那一间。其它房间都上了锁，蒙着花缎的古旧家具、稀奇古怪的铜器、十八世纪的肖像，正在里面一动不动地、得意地慢慢发霉。

朔风好象一个冻僵了的赤裸裸的老魔鬼，在院墙外面发狂。在它的怒号之中，夹杂着呻吟、尖叫和狂笑。到了夜晚，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了。好象有人使足了劲将大把大把的干雪扔在玻璃窗上。附近的树林在哀诉，在呼号，仿佛潜伏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危险。

风钻进了不住人的房间和哀嚎着的烟囱，于是整个年久失修、百孔千疮、摇摇欲坠的旧宅，突然发出一片奇异的声响，使我听了不禁心惊胆战。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间带烟囱的大厅里发出一声长叹，那声音显得那么深沉，凄凉，若断若续。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又似乎有人来回走动，迈着沉重而无声的步

子，把干燥腐朽的地板踏得咯吱咯吱发响。同时，就在靠近我房间的走廊里，我仿佛觉得有人小心而又执拗地转动着门上的把手。后来，大风突然更加狂暴，在住宅里左冲右突，发疯似地摇晃着所有的护窗板和房门，或者钻进烟囱里哀鸣，声音是这样的可怜、沉郁和悠长，忽而又越拔越高，越高越细，简直成了哀诉的尖嚎，忽而又低沉下来，化做野兽的吼叫。有时这位可怕的客人天晓得从什么地方也钻进我的屋里，穿过我的脊背，使我感到一阵寒颤，在上端烤糊了的绿灯罩下面，昏黄的灯焰被吹得左右摇曳。

这时，一种奇异的不可名状的惊恐袭入我的心头，我不由得想道：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荒凉的冬夜，我呆在一所破旧的住宅里，置身于被树林和积雪淹没的荒村之中，远离城市生活几百俄里，远离社会，远离女人的笑声，远离人间的话语……我开始觉得这风雪交加的夜晚，似乎会延长到几年、几十年，一直延长到我生命的末日。窗外的风会一直这样怒号，烤糊的绿灯罩下的灯焰会一直这样昏暗地点着，我会一直这样忐忑不安地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声不响地坐在火炉旁边出神的亚尔莫拉，会一直这样坐着出神——这个奇怪的、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似乎无动于衷：不管他家里是否已经断炊，不管狂风如何怒吼，也不管莫名的哀伤正在刺痛我的心。